

■ 学人素描

张曙光：亲历经济改革 融通学术精神



张曙光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

他在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等研究方面都享有盛誉，其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的基本倾向是信奉市场原则的价值观。

对中国制度分析理论发展的推动及致力于实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让他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使他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宿将。

◎ 邓聿文

2004年，张曙光的《思想自由与经济自由》一书出版。作者在序言中说：“锐利而不尖刻、宽容而不媚俗、沉潜而不避世、自由而不浮躁、热烈地关注现实、虔诚地面对学术、以人的尊严和理性的理性为依归，以学术的独立和繁荣为最终理想，让经济学贴近和关注大众，让大众亲近和理解经济学。”以这段话来概括张曙光的学术追求和人生态度，是最恰当不过了。

年近古稀的张曙光生于1939年，陕西长安人。尽管已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岗位上退下来多年，但他依然活跃于中国经济学界，是多个重要学术组织的成员。在张曙光的众多学术头衔中，有一个不能不提，这就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这是晚年张曙光的身心之所。

这个由他和经济学家茅于軾和盛洪等创办的民间经济研究机构，经过十几年的惨淡经营，如今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在推动学术走向社会，推动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他主持的“宏观中国”论坛和撰写的宏观分析报告，从1997年开始，每个季度一次(篇)都受到了国内外媒体、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推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作用

张曙光在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面享有盛誉。概括起来说，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的基本倾向是经济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经济学说，主张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是最早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的《国富论》告诉人们，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

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不过，张曙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更多受到了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精神影响。哈耶克主张，要确立和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崇尚事物的自然生发和自然演化，疏于人为的制度设计和秩序建构。张曙光服膺经济自由主义的背后，是在传统知识分子的强国梦想之外，多了一份保护个人财产和自由的责任担当。

他在文章和演讲中多次谈到这一点。目前经济生活中一大突出问题是政府的行政干预权力过大，再加上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自我授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较大。为此，他多次呼吁要实施限政，并建立违宪审查程序。同样，他也是很早呼吁两税合一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两税不一，扭曲了政府行为，也扭曲了企业行为，不但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市场地位，也造成和加剧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使中国经济处于高风险的运行状态，还使得促进增长的作用逐渐弱化，造成的浪费越来越大，也使得能源环境负担日益增加，福利损失越来越大。

近年来，“利益集团”这个词在中国很不好听，一提到利益集团，大家似乎不自觉地把它与强势群体和社会不公联系起来。不过，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张曙光却公开为利益集团辩护。他在《利益的公开主张和自由表达》一文中说，我觉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如果大家都是一个利益，就没有社会了。虽然他也承认，利益集团的固化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他也认为，既然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就应当给各个利益集团一个表达和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渠道。

所以，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不同的利益集团如何公开地表达他们的意志和要求。他指出，既然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利益，大家都主张，都能表达，就能形成一个互动的过程，也会形成相互的制衡，然后人们就可以对此进行评判和议论，看合理不合理，正当不正当，应该如何权衡、如何

选择、如何决策。如果不让公开主张和表达各自的利益和诉求，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何能够使得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可以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机构，使各个利益群体有一个主张、表达和维护自己利益的机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知识结构转型平添丰硕学术成果

张曙光于196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此后就一直没离开过，直到退休。这并非是他没机会去一些物质条件更好的部门工作，而是社科院宽松的学术氛围和自由发表自己观点的学术环境让他不愿离开。他后来和别人一起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学者一样，张曙光在学生时期接受的是苏联范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训练。但在改革开放后，传统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和缺陷，使之渐渐失去了对经验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者要想准确地解释中国的改革发展，就必须进行现代化转型，对传统理论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批判，根据新的现实进行新的概括和探索，提出和发展新的理论。

张曙光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过去所学的那一套方法论知识结构比较陈旧，如果不注意知识更新，学术生命就会枯竭，学术活动也无多大意义，更难称得上学术创造。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努力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自觉更新知识结构。用张曙光自己的话说，他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反思，一方面是为了清理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是为了对过去学术实践和学术思想的一个总结和交代。

知识结构的更新，使张曙光成功地跨越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种转型的结果，一方面体现在其著作中，如张曙光在上世纪末出版的专著《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以及由他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其中，在《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一书中，他比较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的进退与得失，并探寻了失误的原因和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这部著作可以视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反思与总结。而《案例研究》则是已出版了4集研究的系列学术产品，目前第5集《浙江卷》已经定稿，且第6集《广东卷》也已正式立项启动。这项研究主要以中国的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描述和分析一个个真实案例，力图真实再现并从理论上解释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社会变迁过程，由此推进了中国制度分析理论发展。

转型结果的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张曙光亲身参与中国改革以及将现代经济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上。张曙光并不是一个关起

门搞研究的学者，强烈的忧患和责任意识驱使他积极投身于改革的研究和规划之中。他曾参与“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等国家改革思路和发展战略的研究策划工作，并为深圳和海南的开放和开发出谋划策。他还亲自主持了市场化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科基金的多项重点课题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让他四次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两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这么丰硕的学术成果，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也是相当少见的。

亲身参与中国改革及研究经济问题，使张曙光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体认中国改革的发生过程及其原因。他在写于5年前的《外汇管理改革是如何推进的?》一文中指出，25年来的改革历史证明，任何一项改革，都是我们面对危机的挑战和压力做出的应战和回应，带有明显的

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性质。他说，1979年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是因为在世界经济竞赛中我们已经明显落后，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如不实行改革开放，就有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此外，张曙光还对为什么中国改革要从农村开始以及要放开和发展民营经济等问题都进行了精辟分析。他研究的结论是，借外部压力，兴内部改革，也许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1999年10月6日是张曙光的60岁生日，来自北京和外地的100多名中青年学者和经济学家因感召于他的文章与人格魅力，自发地组织给他祝寿。面对自己的后辈，这位经济学界的一代宿将谦逊地说：“未来是年轻人的天下，自己只是一个过渡式的人物，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创新还要靠青年一代学者。”

从张曙光学术思想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立人格、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自由选择，是一个学者成长和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 本期人物话语



美国经济处在衰退边缘

格林斯潘(前美联储主席)日前在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第27届CERAWeek年会上表示，美国经济处于衰退边缘，经济衰退的几率为50%或更高，但目前美国企业的状况最佳，美国经济还未陷入衰退。否则，我们现在谈的是经济衰退的长度和深度。

■ 多声道

雪灾暴露中国巨灾保险不足

吴定富(中国保监会主席)2月15日在保险业抗灾救灾工作会议上说，面对灾害，中国保险的覆盖面还比较低，同时缺乏好的保险产品。截止到1月31日，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37.9亿元，而保险公司预计赔款仅35.19亿元。保险赔款比例低的主要原因，是保险的覆盖面比较低，同时缺乏更多好的保险产品。此外，雪灾还暴露出很多保险公司对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处置重视不够。建立巨灾应急处理的长效机制，提高保险公司应急处置能力，是保险业应对自然灾害的重要任务。

美将采取足够措施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伯南克(美联储主席)2月14日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上就美国经济及金融市场状况发表陈词时表示，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但在2008年底将有所加快。美联储将及时采取行动，推出足够保障措施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美国经济下行风险主要来自住房、劳动力和信贷市场。住房建筑活动未来将进一步放缓，劳动力市场走软也将抑制支出，因此预计美国经济将陷入“增长停滞”。不过，随着财政激励方案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日益显现，美国消费将在今年下半年及2009年得以支撑，美国通货膨胀预期将得到控制。因此，美国经济今年底将出现加速的可能。同时，美联储也将提供“足够保障措施”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逐步将所有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

谢旭人(中国财政部部长)近日在部署2008年财政工作时指出，在深化财税改革的同时，我国将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进一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财政预算管理。我国还要逐步将所有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建立综合财政预算。加强预算管理，预算编制做到科学合理、程序规范。预算执行严格，预算约束强化。与此同时，针对去年超收收入增长迅速的情况，今年我国还将改进超收收入使用办法，逐步将超收收入转入下年度使用。提高预算执行的效率和均衡性。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分析报告和监督考评机制。

货币政策应随情况改变相应调整

樊纲(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月14日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指出，要认识到，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都属于“短期政策”，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情况下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平衡，所以它的重要特点就是相机抉择，不断调整。次贷危机使美国及全球经济面临一定的衰退压力，近期我国部分地区又发生了雨雪冰冻灾情。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当然也应该根据实际在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方面进行及时的调整，而不应该把宏观政策当成一个长期的战略来加以实施。不过，当前货币政策总的方向可能仍应是从紧的，但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也可以有不同的力度。相信我们的决策者们会适当地加以把握。

■ 西窗听风

大都市容得小商贩方显包容大气

◎ 梁雨霞

德国的斯图加特市，是“奔驰”和“保时捷”汽车的总部所在地，工业发达，环境优美。在闹市区，火车站前的国王大街，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摊，那是云南人金姐的谋生地方。金姐因泰国辗转来到德国，一个人拉扯着儿子长大。

金姐满脸沧桑，似在农田劳作过多年。她在德国的营生，说起来非常简单，一小摊白色的首饰，像是银质的。另外，还顺便出售一些电话卡。在斯图加特，并没有城管会驱赶金姐，她在固定的时间来到固定的地方，她的顾客，学生居多，而多数学生经人介绍而来，并成了回头客。

金姐像德国人一样，认真而按部就班地干活。她按时缴纳医疗保险，定期体检，还定期去教会。像金姐这样的年龄性格和长相，就这样安祥而有尊严地生活在异国他乡，据说她还购置了两套居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看到金姐，你或许能活生生地体

会到，德国人是如何实践“(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格言的。

众所周知，德国并非传统的移民国家，然而，一旦在这个国家生根，政府或民间组织会提供一些方便甚至帮助，好使移民与社会融合。

德国媒体中，有一个时髦的词叫做“融合”，与中文的时髦词“和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前者似乎更强调动作，而后者更注重效果。

对比幸运的金姐，国内的小商贩同行们似乎活得很沉重：风吹雨打中做点小本小利的生意，已然颇不容易，还要额外地忍受“影响市容，有碍观瞻”的人为影响。

然而，小商贩对环境资源的破坏，究竟有多大呢？难道会超过汽车工业或任何一种其他工业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吗？

如果说，小商贩的存在对市容构成了负面影响，那么，无非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小商贩们没有足够的钱或缺乏必要的审美训练；第二，

是城市的规划没有为其留下容身之地。这既不是小商贩故意而为，也不是他们自己能解决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呢？答案，似乎已经明了。

如果某些法令法规严格到很多人都敢冒险违犯时，是否该考虑降低门槛了；与其征收不到，不如豁免；与其抄没他人饭碗，不如为其留着；与其封堵，不如引导；与其嫌小商贩的东西不美观而将其砸烂，造成浪费，不如“浪费”一点财政，帮补其达到不影响市容的效果。

退一步说，即使“影响市容”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必将小商贩视为眼中钉。

也许，国内的安定团结，需要良好的政策来帮助老百姓安居乐业，而底层的群众尤其需要扶一把。在引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不应忘记同时引进“社会保障”的人文关怀。

值得升斗小民信赖的政府，一定会有向心力的政府。我们相信，“煮豆燃豆其”的悲剧不会一再生。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研究大家

◎ 梁捷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1994年我国实行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制度，这一制度变革对后来的经济发展影响极大。虽然对“分税制”的利弊尚存争议，但这项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点观察很有意义。

事实上，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分税制思想一直可以追溯到一百年以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有人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不过，真正的分税制是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实施的，但时间很短就被迫停止了。后来虽又继续实施，期间还进行了多次调整和修改，却多次被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阻碍所打断。

在中国财政税收制度研究中，贾士毅是个颇引人瞩目的名字，现在知道他的人恐已不多。贾士毅(1887—1965)，江苏宜兴人，字果伯，号荆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上海法政讲习所，后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1911年，贾士毅从明治大学法政科毕业，获政学士，同年回国被授法科举人，未代“洋翰林”，这也是张之洞的发明。

当时，正赶上天翻地覆的变局。1912年，贾士毅担任了江苏省财政视察员，次年又开始陆续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会计司司长等，并开始他的财政实践和研究。

晚清时期，度支部(即过去的户部)于1908年奏定清理财政办法六条，并拟定了具体的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调查晚清时期的出入款项，并且要编制财政说明书。至1910年底，由各省清理财政局编制的财政说明书基本编竣，去年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包含了这些史料。

在贾士毅担任江苏省财政视察员时，他就开始进行调查和资料搜集，继续晚清的财政研究。当年他编著了《江苏财政调查报告(册)》(2册)，这是民国初年一份很重要的财政调查报告。当时，贾士毅还耐心地搜罗史料，几年后写成《民国财政史》，厚达1800多页。张元济看到手稿后大为佩服，该书遂于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为富有经验、又有学识的财政专家，贾士毅一直在当时中国经济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并灵活地周旋于政府部门、商业银行和大学等多个领域。1920年到1927年，他担任镇江关的监督。1921年，他又作为专门委员出席了华盛顿会议。

从1927年起，贾士毅任上海银行公会书记长，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教授。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陆续出版了《关税与国权》、《关税与国权补遗》和《国债与金融》等专著，对当时中国的财政、税收、外债和关税等问题做了全面描述。

由于他掌握的资料最多，所以充分了解当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情况。在1934年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议定了五项《划分省县收支原则》。1935年，当时的立法院又通过和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确定了财政收支系统分为中央、省(市)和县(市)三级，县市财政由此成为独立收支系统。

自1932年起，贾士毅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兼赋税司司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和江苏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但他仍不忘奋笔撰述。如商务印书馆在1928年重印过他的《民国财政史》，颇受欢迎，只是此书成于1917年，未能包括后来的财政变化，贾士毅决心对此书加以补充续写。

从1932到1934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齐《民国续财政史》(共有七册)，共3100多页，规模远胜过原书，堪称巨著。不过，在1934年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制度继续在变化。1942年，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了改动，将全国财政划分为国家财政与县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省级财政并入了国家财政，三级分税制改成了两级分税制。

两级分税制实施的最大作用就是适应了战时需要。马寅初先生对此有很高评价：“就中央方面言，由于省级财政之归并于中央财政系统，原属地方之田赋与营业税，及契税收入列为中央收入之大宗。同时因田赋改征实物，军粮公粮不虞匮乏，有助于抗战者至巨，确实收到相当成效”。1946年，国民政府在战后再次恢复了三级分税制。

鼎革之后，国民政府取消了分税制，接着发明了“收支两条线”、“分类分成”、“总额分成”和“财政包干”等创新的财政体制，但到1994年又恢复到过去的财政分权体制。可惜，贾士毅的“财政史”只写于1934年，并没有再续下去。

1951年以后，贾士毅移居我国台湾地区，并任我国台湾第一商业银行董事。在海峡的这一边，他的名字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慢慢消失了。